

批林批孔学习資料

(五)

新疆八一农学院政治处编印

一九七四年三月

目 录

右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劲云戈 (1)

林彪贩卖孔老二的天命論是为了篡党夺权
.....傅 丹 尚思达 (10)

孔丘的唯心主义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綫的
哲学基础.....山东大学 刘蔚华 (18)

略論秦始皇的暴力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30)
技术史課習本

鉄 証 如 山
——从孔府的罪恶看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
.....洪 群 (40)

阴險毒辣的中庸之道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大批判组 (53)

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劲 云 戈

孔子死去已经有二千四百多年了。但是，历代反动派、北洋军阀、蒋介石反动派，都捧他为“圣人”。党内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尊孔的。五四运动时期曾经批判过尊孔思想的陈独秀，当他搞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后，就叫嚣要“重新评定”孔子的“价值”，说什么孔子的“价值”在于“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吹捧孔孟是“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瞿秋白曾经搞过“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当他向蒋介石屈膝投降写《多余的话》时，就承认他自己“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有“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王明、刘少奇都是尊孔的。彭德怀也不绝口地宣扬孔子的“忠恕之道”。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在背地里装模作样地谈论“忠恕”和“仁义”，甚至在阴谋炮制反革命政变计划时也不忘写上一句“不成功便成仁”。他们是信古好古、装潢门面吗？不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他们抬出孔子的亡灵，借用孔子的名字、口号、语言和服装，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

孔子是没落的贵族奴隶主的后代，生活在由奴隶社会向

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末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是为了阻止奴隶制度的崩溃和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妄图把社会拉向后退。现在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我国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革命，竭力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把当代的中国社会拉向后退。因此，他们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目标就是“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已经出现以后，孔子以复辟西周贵族奴隶制度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这无疑是反动的。孔子施行“仁”的方法是“忠恕”，而“仁”的标准和限度则是“中庸”。所谓“忠恕”，孔子曾简单地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所谓“中庸”，就是不要“过”和“不及”。孔子对“仁”，还有

“爱人”、“泛爱众”等欺骗性解释，来掩盖其爱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本质。孔子的这些反动论调，适应了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需要，被他们吸收和发挥为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他们用以破坏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这方面，王明是突出的一个。

叛徒、卖国贼王明，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是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对孔子思想不进行阶级分析，反而跟在蒋介石屁股后边宣扬“孔孟之道”是什么“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他胡说孔子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种用剥削阶级的思想、传统、道德来冒充全民族的思想、传统、道德，正是孔子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和搞阶级调和的反动伎俩。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和搞阶级调和，在政治上必然走上投降主义道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竭力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反对划分左、中、右，混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阶级界限，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回到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去。积极推行王明路线的彭德怀，很懂得王明这一套的来路，他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却跳出来大讲孔子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彭德怀鼓吹这一套，就是不准中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侵略

者，不准革命人民起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明奉苏修主子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华旨意，配合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活动，又重新祭起“尊孔”的破旗。他恶毒咒骂秦始皇镇压奴隶主复辟的“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充分表现了他仇恨一切进步措施的反动立场。

(二)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唯心论的先验论者。孔子要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治，主张从“克己”做起，即要奴隶主们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多少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行为。他又很相信“天命”，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天”赋予的。因此，孔子和他的学派特别强调“修养”和内省的工夫，即所谓“慎独”。他们要人们不去接触外界，只要关门修养就能使人从心灵深处体验出“天”所赋予的先验的知识和德性。这完全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一套。为了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以适应地主资产阶级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叛徒刘少奇把孔子及其学派的“修养”，搬到共产党内来。

刘少奇也是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早年被捕叛变，捧着反动军阀赏赐给他的“四书”，从敌人狗洞里钻出来又重新混进党内。他早就是一个尊孔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鼓吹说：“孔子思想在当时是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的，到今天还有其合理的因素”，“对我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有用”，“应该充分利用它”。刘少奇同一切反动派一

样，总是把反动说成“进步”。他所指的所谓“合理因素”和“有用”的部分，并且要加以“利用”的，就是孔子及其学派的唯心主义的“修养”。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出版的黑《修养》，就是刘少奇利用孔子思想破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杰作”。在这本黑书里，刘少奇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是大量引用孔子及其门徒关于“修养”方面的话，号召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向这些复辟奴隶制度的“圣贤”学习唯心主义的“修养”经。他要求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讲孔子的“忠恕之道”，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体贴人家，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在刘少奇看来，“逆来顺受”才算得上实行了孔子的“忠恕之道”，才算有了“修养”。在黑《修养》中，刘少奇妄图利用孔子思想，按照他自己对待敌人屈膝投降的叛徒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员。他妄想否定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深刻阐明的唯物论的反映论，把毛主席所培育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成为实行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的机会主义政党，从而破坏中国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又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要把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统统交给国民党，实行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

“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着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刘少奇要我们放弃武装斗争，就是妄图把

我们党改造成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那样只进行“议会”斗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把我们的党员改造成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不搞革命战争、不要武装夺取政权的“议会迷”。

一九四九年，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即将在全国建立的时期，刘少奇又一次修改出版了他的黑《修养》。一九六二年，我国处于暂时经济困难特别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刘少奇再一次修改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在这两个版本里，刘少奇继续发挥其尊孔思想，而在谈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权和为将来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问题时，却连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也没有用。在引用列宁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两段语录中，刘少奇也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及有关对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论述，都有意地删去了。对照他的另一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行，其反对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用心，就一目了然。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下，召开了一次疯狂吹捧孔子的黑会，竭力煽起尊孔的黑风。刘少奇在天津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说，“要象孔夫子那样恕道”。他还要革命人民“要有很大的气量去容忍一切无理的事情，不要斤斤在意气上计较”。这实质上就是不许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是什么没有“气量”啦，什么在“意气上计较”啦，就是没有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了。总之，刘少奇就是要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孔子的所谓“仁政”，彻底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黑《修养》的要害。

孔子有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的“忠恕之道”，刘少奇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孔子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主张，刘少奇就有“驯服工具论”和“群众落后论”；孔子有“学而优则仕”的谬论，刘少奇就有“入党做官论”和“公私溶化论”。

很难怪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杰出地完成了”把孔孟思想“重新塑造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任务”。刘少奇就是妄图利用孔子思想腐蚀和毒害我们的党员，使我们党员越“养”越“修”，使我们马列主义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从而使整个党和国家都改变颜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黑《修养》，批判了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沉重打击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罪恶企图。

(三)

孔子言必称周公、文王，说他们是天生的“圣人”，是“生而知之”的特殊天才，非常崇拜他们。至于他自己，有时虽然也说是“学而知之”者，但实际上他标榜自己也是象周公、文王那样的“天才”。他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孔子梦想把当时社会拉回到西周天子的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中去，造成他所谓的“天下有道”的政治局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

（《论语·季氏》）这就是要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到承天命的奴隶主贵族的总头目手中。他又特别强调贵族奴隶主的等级制度，严格划分治人的“君子”和治于人的“小人”、“上知”和“下愚”的界限。为了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即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统治，孔子大力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维护奴隶制度的人，形成一个以复辟奴隶制度为宗旨的学派或集团，并亲自率领他们周游列国，到处兜售他的反动政治主张，寻找一个可以把它付诸实践的机会，甚至支持并准备亲自参加被他视为有利于复辟奴隶制度和打击新兴地主势力的地方叛乱。由于孔子这种对抗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行径，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只能到处碰壁。当时就有人批判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孔子的这些反动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后来被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地主阶级吸收和发展为封建帝王的“天人合一”、“王权天授”的反动政治理论。

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也是尊孔派。他吹捧孔子的反动政治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疯狂地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正义措施，而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辩护。林彪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来自孔子的“生而知之”、“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谬论。林彪混进革命队伍以后，顽固地坚持剥削阶级世界观，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要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当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林彪同刘少奇一样，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效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在背地里攻击我们对被赶下台的反动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讲“忠恕”，是“做绝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驳斥主张对

敌人施“仁政”的孔孟之徒时指出：“‘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坚持了毛主席这一条原则，才保证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林彪的咒骂，只是暴露出他自己是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代理人。

林彪继承了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衣钵，大力宣扬从周朝以来的几千年的政变史，蓄谋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方法，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建立一个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林彪按照孔子唯心论的先验论，把他自己和他的儿子，打扮成什么“超天才”。他和他的死党利用这种形式“大树特树”林家父子的“绝对权威”，为建立林家父子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还网罗了一小撮反革命死党，结成一个阴谋集团，并建立武装特务组织。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林彪的指使下，这一小撮反革命死党又炮制了一个《“571工程”纪要》，精心策划了一个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但是，林彪同历史上一切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一样，在人民群众中极其孤立，因而他们的阴谋计划必然遭到彻底失败。他们叫喊“不成功便成仁”，实际上是夜过坟场吹口哨，给自己几个死党壮胆，作垂死的挣扎罢了。林彪反党集团永远也“成”不了“仁”，请出孔子的亡灵和主义，也无法挽救他们彻底败亡的命运，就因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子的倒行逆施一样，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在

我们党内企图借用孔子的亡灵来达到破坏中国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这更加清楚地说明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们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認真看書学习，弄通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一切剝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載《紅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

林彪販賣孔老二的天命論是 為了篡黨奪權

傅 丹 尚思達

林彪為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不但拋出了一條反革命的政治路線，而且拋出了一條為他的政治路線服務的思想路線。他自比“天馬”，以“人主”自居，自吹腦袋“特別靈”。這完全是孔老二的天命論的翻版，是為他篡黨奪權，建立封建法西斯的王霸之業所製造的反革命輿論。

孔老是復辟奴隸制的死頑固，他極力鼓吹唯心主義的天命論。有一次孔老二到了宋國，和他的弟子在一棵大樹下

大演周礼，宋国司马桓魋（管军事行政的大官）要杀他，他只得化装逃跑，同时却自欺欺人地说：上天把统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赋予了我，你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孟轲与孔老二唱一个调子，胡说：如果老天爷要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孔孟都用“天生圣人”的谬论来神化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为救世主，借以吓唬和欺骗人民群众。

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完全继承了孔孟之道的衣钵，把自己吹成“天生”的“伟人”。早在一九六二年，他就写了条幅，自比“天马”，说什么“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天马”就是“神马”。“行空”，就是形容马的奔驰好象腾云驾雾。“独往独来，是为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意思是说“圣人”神通广大，他不受任何物质条件的限制，能排六合，超九州，随心所欲，主宰历史。这种人当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所以说是“独有”，独有的人，也就是天生的统治者，他可以独断专行，称王称霸，实行独裁。林彪自比“天马”、“至贵”，以为只要他“振臂一呼”，“就有人跟着跑”；“一声号令”，就可以“改变面貌”，复辟资本主义。

一九六二年前后，正是国际上的帝、修、反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华大合唱；国内的阶级敌人与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跳了出来，赤膊上阵，抛出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明目张胆地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及时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这个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林彪这

个反革命两面派，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出什么“天马”、“至贵”的叫嚣，同刘少奇相互呼应。足见他妄图进行复辟，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狼子野心，由来已久。

这时，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也出来鼓气，说什么林彪是“天马行空，猛志常在”。表示了这伙阴谋分子要作垂死的挣扎。“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是说上古神话中的一个怪神，与上帝相斗失败了，被砍了头，但他还拿着盾牌和板斧挥舞着，以示决一死战。陈伯达奉赠这条条幅，用以表示他们的反革命野心常在，死而不已。“**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林彪反党集团或公开攻击，或借古讽今，都是为了抡班夺权，也是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

其实，叛徒林彪发出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反革命叫嚣，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早就宣布过自己“天生是做独裁者的”，“自己有天赋义务治理一国人民”，叫嚷他所培养的法西斯分子，应该是一些“地球在他们面前都发抖的人”。独夫民贼蒋介石也吹嘘自己是“能超出一切的常人，成功最大事业”的“超人”。反革命野心家林彪不过是拾起他的前辈们的牙慧，狂吹乱叫一通，只能说明这帮家伙做贼心虚。历史早就证明，“天马”也好，“超人”也好，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二

林彪这个反党集团头子，为了建立他日夜梦寐以求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早就对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

的反革命统治术醉心不已了。一九六九年冬，正当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后不久，全国亿万军民在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可是林彪这个野心家却窜到苏州，翻出当年汉高祖刘邦所下的一道征求贤才的诏书，从中摘录了一段话，这段话的原文是：“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周文王是殷末周族奴隶主头子，任用姜太公吕望，诡称“受天命”，表面上对商恭顺，骨子里却一心想取商天下而代之，后由其子武王灭掉商朝。齐桓公是春秋时齐国国君，任用管仲，打着“尊王攘夷”拥护周天子的旗号，玩弄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林彪抄录这段话，表明他对周文王和齐桓公，极力推崇，大为欣赏。这是因为周文、齐桓建立王霸之业的反动权术，正适合林彪阴谋篡党夺权的口味，同时也不打自招地暴露了他当“人主”的野心。

林彪在抄录这段话时，有意把“患在人主不交故也”中的“患”字圈去，并改“交”为“骄”，意思是说，只要“人主”不骄傲，贤才就会为他所用。林彪这样一改，暴露了他污蔑和攻击我们的党和国家不能任用“贤才”的险恶用心。

林彪所谓的“贤才”是些什么人呢？是那个“天才理论家”陈伯达，这个家伙善于制造谣言和诡辩，在他那个“退思书屋”里，惯于玩弄“以退为进”的反革命策略；还有一个是被陈伯达吹捧为当代“古贤”的死党，她有“静气”，有一股反革命的骨气，遇到“大事”能沉住气，夫唱妇随，称得上是林彪的“贤内助”；还有一个是林彪的孝子，是一

个阴险、毒辣的法西斯分子。可见，林彪起用的“贤才”，是一帮狐群狗党。“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林彪就是要用这些叛徒、特务、托洛茨基分子，为他摇旗呐喊，扶助他南面登基，建立封建法西斯的王霸之业，可是好景不长，曾几何时，他们这帮倒行逆施的小丑，就都被历史的车轮压得粉碎。

三

孔孟为了替世袭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进行辩护，把他们一伙打扮成是“受命于天”的“圣人”，极力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孔老二说什么“生而知之者，上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把自己说成是从娘肚子生下来就具有知识的“天才”，而把劳动人民污蔑为遇到困难也不肯学习的蠢才。孟轲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第一次把“天”与“才”连在一起，鼓吹什么“天降之才”。孔孟天才论是奴隶社会中贵族世袭制度的反映，是奴隶主贵族头脑中所形成的一种阶级偏见。在他们看来，只有周文、齐桓这类人是“天才”，是“圣人”，是奉“天命”来进行统治的。因此，这种天命论是一种为奴隶主的统治作辩护的理论。

林彪和孔老二“心有灵犀一点通”，也跟着叫嚣说，“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那么，林彪所说的天才指的是什么呢？他说：“我认为人有两方面：一方面有天生的问题，一方面有教育的问题。”

人才，人的智慧和能力，这是两方面的结合”。又说，“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这就是说，人的智慧、才能，包括温文、豪放、理智在内，既是先天带来的，也是后天受教育的结果。表面看来，似乎他还主张后天的作用，有一点“唯物主义”的气味，实质上是妄图以此来掩盖他鼓吹的“生而知之”的天才论的实质。用折衷主义为这种谬论辩护，这只不过是枉费心机。或者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来源于实践，这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或者认为知识、才能来源于老天爷或自己的头脑，这就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两条截然相反的认识路线，水火不相容，绝对不能调和、折衷。林彪既然认定人的才能、智慧是“天生”的，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生而知之”论，就是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且受于人”，什么“有教育的问题”，等等，通通是骗人的鬼话，是一种荒谬的狡辩。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是林彪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是他妄图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林家世袭王朝的精神支柱。

林彪还厚颜无耻地说：“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这种不打自招的供认，实在妙极了！哪里有什么唯物主义影子。这就彻底揭穿了林彪一伙捏造的所谓“天才论不等于先验论”的谎言。

好一个“爹妈给的么”。这和孔老二门徒吹捧孔子“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有什么两样！林彪只不过把“上天”具体化为他的“爹妈”就是了。林彪的爹妈又是什么人呢？是敲骨吸髓、压榨劳动人民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照林彪的